

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編

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

啓功題籤



李東琬 主編

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

文物出版社

題 簽 啓 功
攝 影 鄭 華
封 面 設 計 崔 陟
責 任 編 輯

(京) 新登字 056 號

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

編 者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
出版發行者 文物出版社
北京五四大街二九號

印 者 美通印刷廠
銷 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一版
一九九七年八月第二次印刷

定價：玖拾陸圓

787×1092 1/16 印張：13

ISBN 7-5010-0958-9/J·345

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序

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文物收藏非常閎富，其間璽印一項，尤以精美珍奇著稱於世。一九八四年曾編有《周叔攷先生捐獻璽印選》，一九九六年有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箴言吉語印選》，出版後深受學者和藝術家歡迎。現在又特選出藏品五百鈕，由李東琬先生主編，匯成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》一書，內容更為美備。這對璽印的研究鑒賞，無疑是很重要的貢獻。

古璽印素為學術界所重視。明代已有璽印的專門譜錄，如顧從德《集古印譜》鈐本，是不可再得的珍籍。璽印的收藏研究在清代漸趨鼎盛。例如先秦古璽和所謂「周秦」印的區分，是顯著的功績。晚清雒縣陳介祺氏樓號萬印，所輯《十鐘山房印舉》多達一百九十一冊，蔚為大觀。在這樣的風氣之下，學者如羅振玉、王國維、馬衡、陳直，

藝術家如黃賓虹、沙孟海等，皆有著述，收獲殊豐。隨後羅福頤先生稟承家學，在璽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同時海內外學者致力於此的也愈來愈多。今天，璽印之學已經是文物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了。

和過去的情況不同，當前的璽印研究應該更多依靠考古學的材料和方法。對於非發掘品，也不能祇看文字，不顧質地、形制等方面。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》和文物出版社前此印行的故宮博物院、吉林大學所藏璽印選集一樣，每鈕璽印除鈐本外，都有形制照片，並注明質地；肖形印還特別製有封泥，使其圖形纖悉畢見，為研究者提供了完整的材料。

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》的內容，上起東周，下至宋元，可謂琳琅滿目，美不勝收，在此無法逐一介紹，祇能試拈幾點，供讀者參考。

我國璽印肇始於殷商。商與西周古璽實物業已發現，春秋時期有璽，明見《左傳》，具體實例前人尚未能舉出。本書第一鈕「王兵戎器」，是流傳有自的著名珍品。陳邦懷先生一九八三年為《周叔弢先生捐獻璽印選》撰序，稱該璽「為蘆齋舊藏古鈔之冠。考其文字無一不合於古文籀文，與戰國文字迥乎不同，而與春秋之秦公毀及秦獵碣文（即石鼓文）血脉相通，今定為春秋之秦制」。陳先生這一論斷，可惜沒有引起學術界的注意。

「王兵戎器」璽，璽面呈菱形，有交叉界格，半環形的索紋鈕，極為獨特。細察璽背滿佈細密花紋，係勾連狀的蟠螭紋，和秦公毀的勾連紋接近，但小螭有目吐舌，又有所差別。同璽上花紋最類似的，是鳳翔姚家崗發現的秦宮殿青銅構件。構件上有橫S形吐舌蟠螭紋，乃由西周晚期以來吐舌夔紋演變而成，可能比秦公毀略早，而仍在春

秋中期。「王兵戎器」壘的年代應差不多。

「王」字或釋為「壬」，然於字形不合。「王兵」語見臨沂銀雀山竹簡篇題，「戎器」則見《周易·萃卦》象傳。春秋時秦稱公，此處的「王」當與石鼓文「嗣王」相同，係指周王而言。壘文所指戎器或為秦獻予天子之物，也未可知。無論如何，從紋飾、字體來看，這確是唯一能够推定的春秋古壘。

本書先秦古壘還有許多精品。有些是近年學者專文討論過的，如于豪亮先生論第二鈕「長平君相室錄」，吳振武先生論第七鈕「政錄」，朱德熙先生論第十鈕「左廩桁木」等，各有所獲。這些古壘，以國別言，燕、齊、三晉以及楚、秦，無所不有。字風鈕制，各各不同，足供賞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燕壘為數較多。例如第三鈕「佑」字與清光緒初易縣西關發現的「單佑都」長條形壘一致，當為燕

物。第四鈕「騎右將」曾收入陳紫蓮《燕陶館藏印》，也是燕物無疑。「騎」字上半「馬」含有公形，同於某些燕官璽，故借用下半「奇」的上部。第十二鈕地名「甫陽」，見吳大澂《十六金符齋印存》（張伯英小來禽館舊藏本）。「甫陽都錄」銀璽及故宮博物院所藏「甫陽都右司馬」，皆燕官璽。至於第十三鈕長條形璽，為燕璽特有形制，就更不用說了。

書中第四九八鈕係巴蜀印，印面璽形符號見新都、什邡蜀墓璽印，戈形符號亦為巴蜀兵器所習見。印上方的奔馬形，左側的伸臂人形，則較特殊。

近年學者珍視的秦印，本書中有不少代表作。一九九三年澳門出版的《珍秦齋古印展》圖錄，曾專用秦印一詞。所說秦印自然不限於短促的秦代，而可上至戰國末的秦，下及於漢初，最近發現的秦封泥也是如此。本書如「荏陽

少內「文字橫讀，「曲陽左尉」交叉讀，均為秦印異品。

玉質璽印在璽印研究中有特殊地位，前人如郭熹《漢瓦硯齋古印叢》專設《古玉印》，倪玉書有《秦漢玉印圖錄》等等，都體現這一點。本書古璽如「長平君相室鈐」，漢印如「姜營」、「葉繚」、「楊玉」等，無不有很高的藝術價值。

最後還要提到，本書中《璽印的起源及其發展概述》一文，篇幅不長，却不僅對璽印的起源演變作了扼要敘述，對藏品更有精闢的論斷，謹此推薦於讀者，望勿失之交臂。

李學勤

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四日

於北京昌運宮

璽印的起源及其發展概述

璽印藝術興於商代，盛於秦漢，源遠流長，至今仍在蓬勃發展，是我國文化藝術寶庫的一個組成部分。

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所藏璽印具有數量大、精品多、時代係列全的特點。本書從館藏璽印中擇其精粹，匯輯成譜刊行於世，其目的是為璽印研究者提供資料，同時也為篆刻愛好者提供借鑒摹習古印的範本。

此印譜收錄啟自東周，盛輯秦漢，兼及魏晉南北朝，止於宋元，載印五百方。為了完整地反映古璽印的全貌，印鈕照片配於印文之上，釋文置於印下，以便初學者參閱。肖形印鈐蓋在紙上，祇能顯示圖象的輪廓，難以窺其四面內的細部紋飾，為此，編者特製作了肖形印的封泥，並將其墨拓系於譜中，盡量滿足讀者鑒賞的要求。

在我國，璽印起源於何時眾說紛紜。一說始於商代，

一說源於春秋戰國之際，也有說黃帝堯舜夏桀時代就已經有璽印了。目前說法不一，尚無定論。

古書《春秋運斗樞》、《春秋合誠圖》曾提及黃帝和堯舜有璽，《汲冢周書》說夏桀有璽，但這些書多是漢代讖緯之說，或是後人臆造推測之言，不能作為此時即有璽印的依據。

目前所見比較確切的最早關於使用璽印的記載是《左傳》中的一段文字，說襄公二十九年，「公還及方城，季武子取卞，使公冶問，璽書追而予之」。襄公二十九年為公元前五四四年，係春秋中期。「璽書」，即以璽印封記的文書。這條文獻記載說明春秋時期已經使用璽印，而且從大量存世的戰國璽中得到證實，這是持璽印起源於春秋戰國之際者的主要之依據。

然而，就現有的實物而言，戰國璽並不是時代最早的

璽印，傳世古印中有三方安陽出土的銅印，經于省吾先生鑒定收入《雙劍謬古器物圖錄》。李學勤先生在《中國璽印的起源》一文中，確認此三印中有兩印是商末之物，並且作了釋文，一方為「亞羅，示。」一方為「翼子」。

要回答璽印的起源問題，首先需要確定什麼是璽印。璽印有其自身的基本形制：自印的頂部至底部為「印身」，印身的頂端有便於持握按印或佩帶的「印鈕」（或印柄），底部有能够刻鑄文字和圖形的「印面」，由這三部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璽印。璽印具有按印印迹的基本性能。

關於璽印的功能，東漢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中釋「璽」為「王者之印也」。印，執政所持信也。就是說，璽印是代表權力和信驗之物，後人多沿襲此說。璽印在漢代有很大發展，對帝、后、諸侯王、各級官吏用印都有明確

的制度規定，在當時，璽印作為權力、信驗的功能更加突出了。清王筠在《說文解字釋例》中說：「漢承秦制，獨以璽為王者印之名，故凡漢帝服御之物，自古同名而異制者，皆以漢制說之，以見說文為漢代之書也。」許慎所云不是古制，而是以漢時璽印的主要職能來釋「印」與「璽」。如果以此作為璽印的定義，那麼不僅現有的商、西周時期的印章不是璽印，就是戰國秦漢時期的吉語印、箴言印、肖形印也不在璽印之列了，顯然這種解釋是不全面的。在璽印的漫長發展歷程中，代表權力和信驗之物，無疑是璽印的主要社會職能，但不是全部職能。大量歷史遺物證明：璽印的功能是多方面的。以戰國秦漢印為例，有用於封緘驛傳公文、書信、物品的官私印章；有佩帶在身以辟邪禍的「黃神越章」、「天帝煞鬼」等宗教印章；有規戒言行的取其祥瑞的箴言、吉語印章；有禳災祈福和用於賞玩的肖

形印章；有打烙牲畜、漆木器具的印章；也有撫印陶器款識的印章等等。

現在不僅發現了大量的戰國時期鈐印陶文的陶器，而且還有商周時代、春秋時期鈐印的陶文遺物（參見高明《古陶文滙編》，牛濟普《中州印陶概述》），說明這一時期已經有了印製陶文的璽印。

八十年代初，周原遺址出土了兩件西周璽印（見《試論周原遺址出土的西周璽印》，《文物》一九九五年十二期），均為銅質，鑄造陽文，印身扁薄。一件是雙聯印，兩印面由一絞索狀橋形鈕聯接，上面分別鑄有三角形紋和S形雲紋。另一印為橋鈕，印面鑄鳳鳥紋。兩印上的花紋與西周時期的銅器、陶器上的紋飾風格相合。

前面提及的「亞羅，示」，「翼子」兩件商代銅印，皆為方形，印身扁薄，上飾鼻鈕，鑄造雖然粗簡，但已具

備璽印的基本形制。兩印的印文均為陽文族氏，應是用以按印印迹的器物。

璽印是應實用的需要而產生的，它的功能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擴大，從現存實物看，最初是用於按印陶器、青銅器陶範上的花紋和陶文。

新石器時代製作陶器，即用木拍或陶拍在器物上拍印花紋，到了商代，用陶拍子、陶印模印製陶器表面的各種紋飾就更普遍了。在鄭州商代製陶遺址中，出土有饗饗紋、夔紋等各種紋飾的長方形印模和蘑菇狀、橢圓形帶鼻的陶抵手，這些製陶工具為璽印的出現提供了基本性能的前提。而商代青銅煉技的高度發展，陶製塊範鑄造技術的發達，又為璽印的產生提供了技術條件。

綜上所述，商代已產生璽印的說法是可信的。

璽印自產生至今已三千多年的歷史，廣泛用於社會

約有兩千五百年。每個歷史時期的璽印在用字、形制、鈕飾和章法上都有着各自的風貌。

商代和西周的璽印，印面多作方形，間或有圓形和三角形，印身扁薄，上有鼻鈕或瓦鈕。印面佈局簡單，有的是鑄刻陽文的族氏，字體近於甲骨文和金文；有的是鑄刻花紋圖象，風格與陶器、青銅器上的紋飾相似，質材均係青銅，鑄造較粗簡，是璽印的早期階段。

春秋戰國是我國古代社會大變革的時期，奴隸制日趨解體，封建社會開始確立，社會經濟、政治、文化發生了深刻變化，以郡縣為基礎的君主集權制，替代了過去家長制的奴隸主貴族的聯合政體。中央和地方的各級主要官吏均由國君任免，由於國君與臣下之間不再以血緣宗法關係為政治聯系的天然紐帶，在任免官吏時，就需要有一種象徵權力的信物授與臣下，因而建立了璽封制度。官吏上任

時，由國君授與印璽，大小官吏靠璽來行使權力，免職時將璽收回，國君掌握了璽，也就掌握了對官吏的任免權。《韓非子》中有很多關於國君免官「收璽」、「奪璽」的記載。如「西門豹為鄴令，清剋潔慤，秋毫之端無私利也，而甚簡左右，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。居期年，上計，君收其璽。豹自請曰：『……願請璽復以治鄴，不當，請伏斧鑕之罪。』」說明了印璽與官吏陞遷任免的關係。

璽印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普遍使用，而且具有了作為代表權力的憑證信物的社會職能，此印譜即收有這一時期的官璽。如「勿正關鈔」，在古文字中，「正」與「征」字通，「勿正」即「勿征」。「關」字作「關」，與楚鄂君啟節之關字同，具有楚文字特徵，故此璽為楚國官璽。《禮記·王制》載：「關，譏而不征」，鄭玄注：「譏，譏異服，譏異言。征，亦稅也」。「勿征關」即謂此關祇